
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的就业与发展状况调查^{*1}

曾燕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200020)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挤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情况,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作为高知识群体,他们在上海的就业与发展情况如何,不仅对大学毕业生本人,也会对上海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世博会召开之时的上海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上海新近2~3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进行调查,认为目前地大学毕业生存在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相关部门应予以必要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 就业 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0)12-0082-006

当前,青年白领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思想价值定位。

一、青年白领的就业与发展现状

为了解上海大学毕业生的情况,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别对公务员、国企青年、非公经济打工人员、外企白领、创业者、中学教师等不同职业大学毕业生38人进行问卷调查,做个案访谈85例,经过SPSS软件分析,认为上海大学毕业生的总体情况良好,生活和职业相对稳定,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对社会转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主动适应社会抱积极态度。然而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

(一)工作满意度是上海高校非上海生源大学生最高

对于现有的工作,大多数人是满意的(84.2%),有跳槽打算的人也在少数(13.9%)。不少大学生认为自己刚入职还是想多学习一些技术和业务。关于满意度,不同生源情况存在差异,上海高校非上海生源满意度为100%,上海高校上海生源满意度相对较低(76.9%),非上海高校大学毕业生满意度为80%。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上海生源大学生对职业期望较高,并且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源也使他们更有选择的可能。上海高校非上海生源大学毕业生凭借读书期间对上海的了解和方便条件,比非上海高校大学生更占优势,他们对上海现代化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有更强的适应力,也更知道自己来上海是要靠个人的努力,因此,他们的总体收入在三类青年中也是最高的,体现出他们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最高。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非上海高校大学生在低薪和高薪两端所占比例最高。近年来外省市高校毕业生来上海打拼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与上海高校大学生竞争,然而毕竟人数相对少,来上海也更不容易,所以,出类拔粹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来上海发展,和上海高校大学生水平差不

¹收稿日期:2010-10-27

多的从事低薪工作较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市人才流动的渠道和促进措施还要进一步拓宽和加强。上海海纳百川，不仅是国际性大都市，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人才高地，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对上海建设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 职业发展目标以做专业人才居多，国企大学生改变现状的愿望较强

调查发现，不论什么职业类别的大学毕业生，职业发展目标大多以做专业人才和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68.4%);想拿高薪的占18.4%;想做领导，最好是高管的占10.5%;认为目前无所谓，积累一定经验和资源后创业，自己当老板的占2.6%。通过职业类别分层分析我们发现，在想做专业人才者中，以创业大学生和教师居多，打工大学生最少;想做领导，最好是高管的以国企大学生为多，其次是教师;想拿高薪，生活富裕的是公务员居多，其次是国有企业大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就行的以非公经济的打工大学生为多，其次是外企白领;想创业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集中在国有企业大学生中。在问到现职工作情况时，回答“机会很多，由于个人能力和精力等问题要有所放弃”的明显高于回答“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自己的能力不能很好地展现”的，关于“单位用人不合理、不公正，职业发展受限、机会不多”的在本次问卷调查中选者极少。本次调查中我们认为，在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大多数人能够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能够踏踏实实地去做本职工作，职业环境较好，具有上升发展的空间。但是，国有企业大学生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中仍存在一定问题，收入在六类职业大学生中最低，1000～2000元的最低收入者达33.3%，他们实现个人价值和提高待遇的想法更强烈。

(三) 大学毕业生进取心强烈，均有提升职业技能的愿望

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大学毕业生是否有提升职业技能的需求时，所有人都认为自己需要。在访谈中，大学毕业生认为有按照自己工作性质进修和培训的需求，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很有必要的，否则就容易被淘汰。当问到需要怎样培训时，大学毕业生认为提升方式有几种，比如单位按照岗位组织员工出去培训，还有就是根据自己的不足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业余的课程。但是普遍反映目前单位在这方面的机会还远远不够;也有人想通过在职研究生来提升自己，但是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和途径。

(四) 在工作中具有敬业精神，享受生活观念得到认同

当问到如果单位有的工作要出不少力，但没有利益时，回答能认真完成的占84.2%，应付了事的占10.5%，不做的占5.3%，说明大学毕业生在工作中具有相应的职业道德。按生源情况分析，90%上海高校非上海生源大学毕业生能够认真完成，外地高校毕业大学生占86.7%，上海生源大学毕业生占76.9%。按父母职业分析，公务员子女比例最低。当问到如果有机会到偏远贫穷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想法时，选择去的人占多数(70.1%)，其中又有一多半(52.6%)以此作为锻炼的机会。在调查中，多半大学毕业生(60.5%)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工作发展空间大，虽然目前条件差些，但是有奔头。在这部分大学毕业生中，985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比非985高校大学毕业生比例更高，男生比女生比例更高;也有18.4%的人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工作不太累，收入又好，没有压力，这样才能心情愉快，女生的选择比例要高于男生71.4个百分点;13.52%的人认为要对得起自己，吃穿用及娱乐等要有品质。

(五) 社会心态较为平稳，积极关注社会发展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是客观的，他们认同改革，肯定生活水平的提高，期待社会稳定发展。问卷调查显示，58.2%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符合国情，坚定走下去中国会大有希望;43.1%的人感到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就得这么走下去，没什么好争论的;46%的人觉得改革开放有成就也有问题，但成就是主要的。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从渴望发展的心理出发，他们迫切希望党和政府对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加大解决力度。当下的青年群体已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追求，他们更希望在参与社会、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提升自我价值，为别人带去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

二、青年白领面对的工作压力

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多能在上海立足，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注重个人利益，但是生存压力也不小。

（一）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

在我国，大学毕业生1978年为16.5万人，而2009年已经达到610万。根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为34万人，2005年增至79万人，2007年100万人，2008年150万人，2009年应届和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860万的数字。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在上海，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6.8万人，上海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85%，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涨幅度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作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涨幅度甚至超过了30%。在上海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的同时，全国各地大学毕业生来上海发展的也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起来。此次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个“滞后期”，而且将会进一步扩大，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

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不少学校教育质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现在不少大学生实际能力已经不如以往的大学生，这也是工资实际价格下降而导致偏低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当下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贱卖”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工薪等同于保姆”，与农民工持平，大学毕业生薪酬水平一路跳水……这使人们不由想起存在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的“脑体倒挂”现象。当时社会上一度流传“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说法。而如今，面对金融危机、跨国公司裁员，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大学毕业生，有再次遭遇初次就业工资水平持续走低，从而陷入新一轮“脑体倒挂”的尴尬局面的可能。《2009年上海市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上海200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3103元、而2007届为3853元；平均月收入下降幅度达到19%。上海市2008届本科毕业生的期待月收入、实际月收入与雇主愿意提供的最高月收入分别为2002元、3103元和3258元。当前大学毕业生对薪资的期待较为理性，本科期待月薪底线低于实际月收入1101元。本次调查也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有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若这些大学毕业生“满腹经纶”得不到体现，就业屡屡遭遇低薪、“零工资”，可能会产生挫折感。如果形成群体意识，群体对社会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动荡在所难免，如果波及其他社会成员，后果则更加不堪设想，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而言，难度也大大增加。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

从大学毕业生的主观因素来看，在金融危机下，大多数人选择不跳槽，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低薪或对本职兴趣不高的大学毕业生不流动。但是，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下降还要从客观因素上来看，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尽管当前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那种类似于终生雇佣制度的稳定就业状态并非全部消失了，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3年扩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大学生供给规模的增加导致就业稳定性下降的机制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影响。例如用人单位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他们更倾向于向大学毕业生提供短期、灵活的劳动合同。二是当前“先

就业后择业”的就业政策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就业政策的引导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四)在承担住房极其困难的压力下坚守梦想

根据麦可思(MyCOS)《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08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住房对他们来说是最的问题。上海外环早已没有10000元以下的房子，对于刚毕业几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买不起。然而，租房也不便宜，上海2009年9月普通二居室月租均价为2555元，一室户月租起码在1000元以上，市区更找不到1500元以下的月租房，这对于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讲，租住下这样的住房后就不要吃饭了。他们往往选择“群租房”，一套公寓被划分成了七八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以每月五六百元的价格出租。在上海，三居室的高等住宅隔断成一二十个小隔间，大学毕业生就在这种地方聚居。尽管上海有关部门曾下文不允许将高等住宅隔断，但是事实上规定成了一纸废文。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蚁居”，实属无奈之举。其中也有不少人在简陋的出租房甚至地下室，除了工作和学习，没有经济基础去消费，更没有文化娱乐。他们之所以“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小城市一套房”，原因之一是缘于对事业的追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上海由于经济和科技发达，总体来看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成为大学生的重要选择。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选择群租房的占到15.8%，自己租房的有28.9%，住在父母家的占31.6%，即使有自己的房子的占到23.7%，其中又大多有家里帮助。

(五)生活方式对大学毕业生构成的压力

其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交友婚姻困难。在问卷调查中，有18.4%的大学生最焦虑的事情是由于接触圈子太小，个人恋爱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在访谈中不少大学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生活接触的范围比较狭窄，定位和目标的认定上也存在问题。在大城市里，社区是陌生人社区，平时似乎接触人很多，但是真正比较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多。现代职业的工作性质使人与外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更习惯、更青睐数字化的沟通方式，而婚恋是必须与现实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龄未婚的现象逐年上升，一些研究生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快30岁，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对大学生的压力很大。

其二，“月光族”的经济困境。在调查中，“月光族”不在少数，目前对于生活中焦虑的事情，有36.8%的人是因为工资不够用，其中，26.3%的人每月工资不够用是因为“我是月光族，收入还可以，但是每月消费较多”，其次是由于“收入低，勉强生活”(10.5%)。在问到理财方式时同样也印证了这一情况，有1/3的人没有钱。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月光族占到1/3，是被调查月光族大学生的60%。调查还发现，男生中有16.7%为高消费月光族，女生则高达35%。

其三，缺少文化生活。调查表明，有18.4%的大学生最焦虑的事情是缺少文化生活。不少大学生的实际工作情况是“比劳模还忙”，每天二点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休息时间又由于不少大学生住处较远，文化娱乐生活不方便，消费也大，况且现在上海大学毕业生大多是外地青年，朋友不多，所以在上海繁华的大都市中，大学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却生活在“文化沙漠”中。

三、完善上海大学毕业生发展环境的建议

影响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性的因素主要是学校培养、毕业生个人的能力及认知、政府制度建设等。在上海世博会召开及世博后的时期，上海市人才建设越来越成为重中之重，因此，针对大学毕业生生存与发展的制度建议成为引领其适应上海发展的保障。

(一)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

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是这并不能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以后失业大学生还会增多，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判断。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二）增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稳定性

以前国营单位里大学生还是专业对口的，但是在民营、外资以及合资企业中的大学生改行率都相当高。到了2007年，国营单位的改行率与民营、外资、合资的区别并不大了，大学毕业生不再把所学专业、工作部门、性质等因素放在择业的第一位，改行成为必然，这是由于行业变化和观念转变的结果，再加上1999年提出的就业率指标，以及将就业率同高校扩招规模相联系起来，对高校专业结构的调整、办学资源的整合、学科建设的加强、办学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就业政策容易忽视对就业质量的追求，也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误配”和不稳定的就业状态。根据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政策的演变趋势，只注重追求就业率单一目标已远远不够，使劳动者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已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目前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大学毕业生尽量专业对口。

（三）为大学毕业生建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尽可能地来自不同地域的低收入大学生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扩大廉租房制度覆盖范围，加强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培训，丰富文化生活，为大学毕业生建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要强调的是，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弱化户口对社会成员流动性的限制，不仅会促进大学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性、能动性，而且会使其流动，就业的空间变得更广阔。流动的自由度是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重要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档合一”所强化的是人才的单位所有，“人户合一”所强化的是人才的地区所有。随着人事档案社会化管理的推行，在今天，“档案”对于人才流动已无多少限制，唯有户口还对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人才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用按需引进代替数量控制，有条件准入代替计划指标，将会成为更多城市和地区引进人才时的基本政策。即便“居住证”仍然存在，但是，对流动人才来说，这些东西的作用和真正的户口簿已经没有多大差别。特聘兼职、资源共享、项目合作、智力引进等不迁户口、不转关系的形式灵活多样的流动可更多地考虑。

（四）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出口—大学生就业已经市场化，而入口—招生还在计划之下，产生大学生就业难、就业不稳定和不公平可想而知，因此，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尤其是对专业结构的调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调整教育模式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使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求得平衡。我国政府从现有的国有高校中逐渐减持股，将有利于国有高校真正进入市场，形成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应变意识，从而提高竞争力。位于美国前20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只有真正进入市场的高校才会具有活力，才能适应市场需求。

（五）逐步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正，即罗尔斯所说的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美德。恰如法国思想家温斯坦莱所指出的：“管理良好的国家法律应以正义的理智为基础，如果这一正义被否定，人民中间就没有法律可言，只有专横的权力了。”社会公正主要是指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统治层所实施的各项国家决策行为，社会总体上的人际关系以及以国

家或集体面目出现的其他行为的客观合理性和合理程度的道德评价。社会公正是稳定社会的均衡器，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直接掌握着制定“游戏规则”的掌权者的公正观念和水准，直接影响着社会公正的性质和水准。当代西方的哲学大师麦金太尔指出：“德性的正当性取决于规则和原则的正当性，后者先于前者。如果后者很成问题，它们也的确如此，那么前者也必定如此。”^②目前，存在于大学毕业生中的不公平主要有二点：一是在职场供远远大于求的情况下，很多用人单位趁机渔利，这种看似正常的市场经济结果，事实上是极不正常的，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二是由于大学生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竞争，农民工子女在高考时分数要高，而就业时收入却是最低，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收入最高的大学生群体是公务员子女。此外，如果大学生毕业生没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么，也会影响教育投资。根据科尔曼（James Coleman）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一些青少年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于基础教育。这不仅对我国社会总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是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大，许多领域甚至出现“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因此，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来扭转这一局面，而不能把这些问题都推于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能包办大学生的就业，但有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的当然责任。

参考文献：

1. [美] A. 麦金太尔著. 龚群、戴扬毅等译. 德性之后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芬兰] 海伦娜. 青年、全球化与就业:基于地区视角的考察. 中国青年研究, 2005年第3期.
3. 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2007-2008:中国就业报告.
4. 黎民. 西文社会学理论 [M].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²①[美] A. 麦金太尔著. 龚群、戴扬毅等译. 《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